母与子--两代人的中美科技合作情缘

作者：李昕

母亲生于 1943 年，而我生于 1975 年，可我俩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学习英语。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家人挤在上海一个 9 平方米的亭子间里，晚上母亲收听广播英语，周日上午则打开 12 吋的黑白电视机收看“Follow Me”，“Join Us”等从国外引进的英语学习节目，而姐姐和我在旁边似懂非懂地跟着，这情形至今难忘。那些日子里播出介绍美国的节目时，母亲和我或许从未想到日后有机会先后以不同方式参与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事业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母亲于 1982 年调入上海市食品工业研究所。当时国内食品安全检测和营养分析领域的研究和标准制订尚处于起步阶段。八十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启动了帮助中国建设食品安全检测和营养分析能力的培训项目。在通过了层层业务和英语选拔考试后，母亲于 1989 年 4 月踏上了前往华盛顿的旅程。在我写这篇征文之际，母亲拿出了当年的工作笔记，上面记录着出国前她写的一段话：“有明确的目标和使命感，回国后（运用国外所学知识）要在科研上发挥重要作用，（争取我国食品界能）跻身于世界行列并显示作用，与国际接轨”。在美国的短短 4 个月内，母亲日日夜夜泡在 FDA 营养监测实验室里，近乎贪婪地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实验方法。而美国同事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关心照顾首次出国的母亲。母亲按时归国的那天，我还记得自己焦急地等在弄堂口，心里想着妈妈会给我带回什么礼物--最终的答案是两个变形金刚玩具，还有一大堆英语学习教材，其中不少是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在母亲“外语为人生打开一扇新窗口”的鼓励下，初中英语极差的我，到高考时已成为成绩最好的一科—这也算是早期中美科技合作的一个副产品吧。

回国后不久，母亲就实现了出国前订下的目标。1991 年，在由 FDA 组织的 “用 PITC（异硫氰酸苯酯）柱前衍生对婴儿奶粉中氨基酸的液相色谱测定”合作研究论证项目结束后，母亲收到 FDA 寄来的证书和信函，称赞母亲主持的中国课题组在参与该项目八个国家的实验室中做得最好。有趣的是得知此消息后，母亲所在单位的实验仪器供应商(是一家美国企业)亚太区总裁主动上门为母亲颁发了奖状，表彰母亲用该公司的仪器通过中美合作做出了一流的科研成果。此后母亲又承担了多项科研任务并获奖，用她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我国食品领域的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每逢周末有空，母亲都要翻出那本记录着在美工作和生活经历的影集来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而我也多承担了一项“家务”--每年 12 月帮着选贺卡，母亲写上祝福的话后由我去邮局寄给她的美国朋友。

1997 年从上海大学毕业后，我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报考了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公务员，离开家乡踏上了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事业之路。2004 年我转到美

大处工作并参与对美科技合作。在翻阅档案时，我很高兴地得知，两国建交后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的第一个政府间协定就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我有幸沿着前辈开辟的道路前进，在随后 4 年多的工作中先后参与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等重大活动，起草了多个合作协定并参与谈判，促成了一批合作项目，也结识了许多美国科技界的朋友。最难忘的一件事是 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科技部徐冠华部长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李维特部长签署了《卫生健康医药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在随后的会谈中，李维特部长问起我的背景，我很自豪地告诉部长先生关于母亲和我的故事（FDA 是美卫生部下属机构）。在座的双方领导人听后，都感到这是中美科技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广参与、高水平”的一个生动例子。回国后当我把会见情形告诉母亲后，她欣喜地笑了。

值此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和《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三十周年之际，谨叙文为记，怀念和感谢三十年来为推动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造福中美两国人民而付出辛勤努力的有关人士。祝愿两国的科技合作事业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